

## 「四重之选」

从义乌分水塘到上海石库门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的

□ 吴小锋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100周年。1920年春,陈望道在家乡分水塘的简陋柴房完成《共产党宣言》翻译工作之后,应邀前往上海担任报刊编辑工作。从而频繁穿梭在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建筑里,参与、发起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随之付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准备。从分水塘到石库门,探析《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历史渊源,留给后人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财富。

历史之选:  
近代中国之衰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裹挟而来「真理的味道」

在1920年,陈望道回义乌老家分水塘翻译《共产党宣言》,演绎了一段“柴房译宣言,粽子蘸墨汁,还说味道甜”的动人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带领政治局同志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时,在陈望道翻译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前驻足,深情地讲述这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注:指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在以后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这个故事阐述“信仰的味道”“真理的味道”。探究这个故事,初看是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的专注和对信仰、真理追求的痴迷。深究之下,背后是一代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和执着。

翻开历史的宏伟画卷,剖析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时代背景,感触到的是当时国家前途命运攸关、民族存亡倒悬一线的艰难时代。拉开历史纵深,上溯到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来,闭关锁国的大门一经打开,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一次次进入赔款、割地、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同时,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各方面仁人志士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从虎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

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最后都没有能够彻底扭转中国的命运。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1899年,《万国公报》卷121刊载了英国学者赫德所作《大同学》一书的节选,译者李提摩太旨在宣扬改良思想,不经意间将宣言片段与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在了国人的视野之中。而后,包括朱执信、赵必振等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对宣言的思想进行了介绍。北洋政府的民国时期,国内上百种社团、几十种主义思潮蓬勃兴起,但在1917年之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甚小。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华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反复比较选择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陈望道也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们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找到了救亡图存的真理之路。《共产党宣言》成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走上不同于以往革命道路的一座航标灯。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通过阅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洞察到了实现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路径,看到了来自理论的曙光、感受到了来自信仰的力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这本书有着深厚的感情。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小平坦言,《共产党宣言》就是他的入门老师。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本书中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并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找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

经典党史故事就像历史长河中一朵朵精彩夺目的浪花,而从一朵浪花中又能看到整个大海的境界。通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党史故事,透视历史这扇窗户,不仅能够找到“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答案,也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时期,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答好时代命题,履行历史担当提供了注脚。

译者之选:  
陈望道「救国之路」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及坚守

《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在早年求学历程中,就踏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求索之路。幼儿时期到青年时期,陈望道“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十六岁离开家乡分水塘到义乌绣湖书院求学,立志“教育救国”;尔后到金华求学,向往“实业救国”“科技救国”;1915年留学日本之后,接触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川均、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思想。求学期间三次思想上的转变,对真理的求索矢志不移、初心不改。

1919年五四运动后学成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成为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受到保守派和反动分子的仇视打击,在“一师风潮”的斗争中一时成为风云人物。由于浙江一师新文化运动和“一师风潮”的实践锻炼,更加坚定了陈望道思想上的最后转变。他在《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一文中回忆,通过“一师风潮”的斗争,“更加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风云人物。对于各种事物“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有了更精的辨别”,“这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正是此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机遇来到了陈望道面前。

五四运动后,涌现了一批如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

知识分子,陈独秀呼吁《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在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现之前,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曾在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但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宣言文本内容博大精深,恩格斯曾经说过,翻译宣言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想要连载《共产党宣言》。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翻译工作难度相当大。推敲翻译宣言的条件,至少要具备三个方面: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学说;二是精通一两门外语;三是有深厚的本国语言文学素养。在物色翻译人选时,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陈望道不负所望,“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完成翻译工作,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评价:“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注:指“一师风潮”),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望道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终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随后参与创建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并热情工作,在党的“一大”后担任了上海地方党组织书记。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以及当时党的领导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家长制作风等因素,陈望道等部分人员先后离开了党组织,但他明确对沈雁冰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此后的陈望道,作为一名进步学者专注于学问和教育的同时,始终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外围,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被后人称为是一名党外特殊的“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表达了重返党组织的愿望,毛泽东主席表态,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开党身份。1957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同意上海市委关于接受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邓小平在文件上署名。

时代之选:  
《共产党宣言》中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美答卷

“适应时代的,才可以叫做真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一年,陈望道在1919年8月《浙江潮》第3期上发表《致仲九》通信中如是说。《共产党宣言》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入中国,产生了犹如一场甘霖洒播引发春潮涌动的景象,这得益于陈望道的译泽之功。

在陈望道之前,中国国内对《共产党宣言》有不少片段式、章节式的摘译,以生涩难懂的文言文居多。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是白话文,文辞简练优美,读者易懂易接受,许多语言文字与现在版本很接近。1920年8月面世后非常受欢迎,读者一抢而空,9月再版。到1926年5月一共印了39版次,平民书社一家就印了17版次,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正如成仿吾在1978年《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陈(注:指陈望道)译本……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注:此句应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前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和领导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槛,就是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这就需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著作。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做好了,才能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性的文本,蕴含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让《共产党宣言》说“中国话”,是将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像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夏秋之交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党领导下第一所培养革命骨干的学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每位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亲自讲授。刘少奇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被称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上的“开山鼻祖”。陈望道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交出了一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代化、大众化译介表达方式的完美答卷,这也代表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初步尝试、探索和实践。

人文之选:  
陈望道故里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春华秋实」效应

陈望道早期曾用过一个“春华女士”的笔名。百年前蕴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共产党宣言》,通过陈望道的笔端萌发“春华”,引燃信仰的火种成燎原之势,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转变。聚焦到陈望道故里,也孕育成就了令人瞩目的改革发展硕果。这可谓是陈望道故里的“春华秋实”效应。

“春华”从何而来?回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乡土历史文化深处,便可彰显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文之选。义乌始于秦时郡县制建县,2200多年间,在这一方“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土地上,文明薪火相传,人民勤劳智慧。陈望道的家乡分水塘处于义乌、浦江交界,交通不便,给人印象似乎是穷乡僻壤,实际上周近都是人文沃土。目前,义乌市及所在地城西街道结合乡村振兴工作,由点到线规划打造“望道信仰线”,纳入义乌和美乡村建设10条精品线路之一。“望道信仰线”纵横十余公里,邻近周边有着星罗棋布的人文遗址:义乌历史最悠久的人类活动遗址——距今约900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桥头文化遗址;南宋理学家徐侨,南宋“永康学派”陈亮称谓“乌伤四君子”中喻良能、喻良弼的历史踪迹;元代义乌大儒黄潜,元末明初文化名人宋濂、方孝孺在圣寿古寺交游讲学的史料记忆;明代中叶抗击倭寇、修守长城的“义乌兵”重要将领楼大有、吴惟忠之故里……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陈望道从幼时起就在无形之中受到了影响和浸润。从少年时期“教育救国”“科技(实业)救国”到谋求社会变革,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承担译介《共产党宣言》的重任,怀抱救国之志、不懈探求真理的“望道之路”,显然根植于故里深厚悠远的人文土壤。甚至陈

望道对于修辞学的研究,回忆小时候有两位擅长诗文的长辈至亲,一位辞藻华丽,一位言简意赅,遂成为领悟和定位积极修辞学、消极修辞学的肇始。

曾在这一带盛行的“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知行合一、义利并行的“事功学说”,不仅能从20世纪40年代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训导时一锤定音为“好学力行”中找到渊源端倪,显然也给义乌现代商贸业发展注入活力。改革开放40年间,义乌从马路市场起步崛起为一座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称誉的世界“小商品之都”。2006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中,总结6个方面的内容,“秉承深厚的文化传统,弘扬独特的人文精神……”的“丰厚底蕴”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养育陈望道成长的家乡故里,传承着文明薪火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实践,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治理中特色鲜明、成绩斐然,堪称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沿着“望道信仰线”,一条现当代发展脉络溯源而上。从2006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座谈会总结推广“义乌经验”的横塘村,到展示“一带一路”倡议早期成果的“义新欧”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始发站,到展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全国党建示范村”七一村,到展示通过“一株薰衣草启动乡村振兴”样板故事的“无中生有”何斯路村,再到陈望道品尝“真理的味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引燃“红色火种”的分水塘村……陈望道故里牵引贯穿的“望道信仰线”,正在示范性地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从义乌分水塘到上海石库门,从乡野农村到繁华都市,百年前陈望道翻译传播《共产党宣言》,怀揣强国富民的愿望和梦想,正从历史远处走向现实,并将走向更加遥远的未来。透过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四重之选”,在“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生动情境中感悟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感受中国近现代先进分子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际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求索精神,领略华夏文明的根深叶茂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磅礴力量,进一步体味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丰富内涵。《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红色印迹,必将启迪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沿着先驱和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